

青铜尊里的中国故事

尊是人们熟悉的中国传统青铜器,代表着泱泱中华数千年文明脉络。“中国”二字最早见于青铜尊铭文,而北京冬奥会火种欢迎仪式火种台的造型,也参考了青铜尊中的“无肩尊”。

尊为何能成为重要礼器?背后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?

尊本是青铜礼器通称

其实,青铜器中的“尊”与“彝”类似,本来是酒器、食器等各种礼器的通名。《周礼·春官·司尊彝》中说有献尊、象尊、著尊、壶尊、大尊、山尊这“六尊”。献尊大概就是今天所见体形像犀或牛的尊,象尊是体形像大象的尊,著尊是着地无足之尊,壶尊是以壶为尊,大尊是古代的陶尊,山尊是器上刻画有山云之形的尊。其中献、象尊在春祠祭、夏禴(yu è)祭使用,著、壶尊在秋尝祭、冬烝祭使用,大、山尊则在四季之间的追享祭、朝享祭使用。

不过,“尊”在甲骨文、金文均是从“酉”从“卣”,像是双手捧酒尊之形。故从北宋《考古图》《博古图录》开始,把“尊”限制为酒器名称,但当时区分也不太严格。直到1941年容庚先生作《商周彝器通考》,才把觚、觶、壶、罍等一类酒器排除在尊外,使尊成为单一器类名称。

这种尊的共同特征是:大口,腹部粗而鼓胀,高圈足,形体较宽。以器身是否有肩部,被分为“有肩尊”和“无肩尊”。有肩尊既有圆尊,也有方尊,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就是有肩尊;无肩尊一般是圆尊,比如著名的何尊就是无肩尊。

不过,除了这类专有名称的尊外,仍有一类盛酒器被统称“尊”,这就是形似鸟兽的“鸟兽形尊”。鸟兽形尊主要有鸛、禽、虎、象、犀、牛、羊、马、兔、神兽等十种,比如著名的妇好鸛尊,外形就是一只猫头鹰的形状。

目前所见最早的青铜尊于1955年在河南郑州白家庄出土,属于二里岗早商文化。这一时期的青铜尊数量不多,纹饰也比较简单,个别出现兽首装饰,无铭文。

因为商代重酒之风的盛行,所以青铜尊在商代晚期发展到了极盛时期。这一时期不但出土的青铜尊多,而且出土范围也非常广,除了河南安阳殷墟之外,南方地



北京冬奥会火种欢迎仪式火种台



何尊

区如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、湖南宁乡炭里河遗址等都发现了青铜尊。方尊也在此时出现,也开始有了少量铭文。

西周前期仍然延续了商文化,而且出现了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尊,比如何尊就有119字(一说122字)之多。但西周中期开始,因为周人禁酒的影响,食器、水器比酒器受到更多重视。青铜尊不但数量大为减少,而且装饰也趋向简化。春秋时期,青铜尊在北方基本已经消失。

目前所见最晚的青铜尊,是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滇人墓葬出土的双牛尊。此后,青铜尊作为一种文化遗存,消亡在了历史长河中。

青铜尊铭文里的故事

青铜尊铭文有一些有趣的史料,可以补充史料的不足,这里主要介绍何尊与珣(di āo)生尊。

火种台的原型就是无肩尊,而何尊就是无肩尊中最著名的一件,它也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。其系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于1965年在龙泉巷金台人民公社征集。该铜尊为方形圆角,状如喇叭,高38.8厘米、口径28.8厘米、腹围61.6厘米、底纵19.8厘米、底横20.2厘米、重14.6公斤。

何尊上的铭文大概说的是,周成王谋划在成周(今河南洛阳)营建都城,对武王举行丰福之祭。四月丙戌日这一天,成王在京宫大室对各族宗子进行训诫,说:“从前你们的父辈为文王效忠,文王得以承受天命;之后武王又战胜了商朝,在朝廷向上天祈祷,说:‘我要以天下四方之中为都城,来统治人民(余其宅兹中国,自之义民)。’你们这些年轻人,要看到父辈有功于天,务必敬重地进行祭祀。”

大臣何听了这番话,认为大王有恭顺的德行,能够顺应上天,教育了迟钝的自己。成王告诫后,还赏赐给何三十朋。当时流行贝币,一朋就是十贝。何用它来制作了这件宝尊,时间是在周成王五年。所以,这件铜尊就被称为“何尊”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,何尊第一次使用了“中国”这个词。尽管当时的“中国”更多是地理概念,但也奠定了后世“中国”国家概念的基础。

珣生尊于2006年11月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出土,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。当时发现了一座青铜器窖藏,其中有两件青铜无肩尊,其形制、纹饰、大小、铭文基本相同,通高31厘米、口径31.8厘米、底径13.6厘米,有铭文113字,被称为“五年珣生尊”。有趣的是,它与过去发现的“五年珣生簋”“六年珣生簋”有关联。

五年珣生簋现藏于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。珣生是周厉王时人,祖先是周初功臣召公奭,当时召氏族长是西周晚期名臣召伯虎,珣生是召伯虎的堂弟,属于召氏小宗。厉王五年正月己丑日,珣生祭祀父亲官仲,召伯虎前来参加。召伯虎夫人传达了召伯虎、珣生祖母君氏的忧虑。原来召氏疏于对附庸土地管理,产权归属不定,经常导致诉讼。君氏要求珣生跟随召伯虎去诉讼,分割方案则是由珣生占五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分成。

六年珣生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说的是六年四月甲子日,召伯虎和珣生对于附庸土地的诉讼工作已经结束。可见,六年珣生簋与五年珣生簋是有关系的。

那么,召氏最终采取了哪种方案呢?五年珣生尊破解了谜团。原来在五年九月初吉日,召伯虎夫人召姜就去见过珣生,召姜提出确定按五分之二方案,这显然对珣生更加有利的。另外一件青铜器还表明,珣生在厉王十一年时还担任过周王室的“宰”。

《诗经·小雅》有一篇《棠棣》,讲的是周人宴会兄弟时,歌颂兄弟感情,其中有一句名言“兄弟阋于墙,外御其务(侮)”。而这首诗的作者正是召伯虎。“珣生三器”的发现,正好可以为这首诗作上一个完美的脚注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神童岂可“人造”

所谓神童,就是指那些智力超常的儿童。然而在宋代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神童,比较知名的有:王禹偁6岁、孔文仲7岁、蒋堂6岁、黄庭坚7岁会作诗。王曾从小“善为文辞”;苏轼10岁“闻古今成败,辄能语其要”;叶梦得“嗜学早成”;张孝祥自幼“读书过目不忘,下笔顷刻数千言”;陈傅良儿时为文章,自成一派,等等。特别是江西金溪农家子弟方仲永5岁“未尝识书具”,但能“指物作诗立就,其文理皆有可观者”。更有甚者,神童杨亿“数岁不能言”,却突然吟咏出《登楼》诗:“危楼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。”

为此,宋代在贡举中专门设立了神童举,又叫童子举,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,称为神童。其中宋真宗时的宋汾、晏殊、姜盖、李淑、蔡伯希等,先后中童子科,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。

宋代实行童子举后,先后有三百多个神童被推荐参加了童子试,但是中试的很少,不完全统计才三十多人。

正是宋代这种童子举制度,催生了人们造神童的热潮。据《文献通考》记载,宋神宗元丰时,置在京小学有“就傅”“初益”两斋。宋徽宗时办学之风尤甚,政和四年(1114年),小学生近千人,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。收八岁至十二岁儿童,率以诵经书字多少,差次补内舍、上舍。州县小学参考在京城小学规约办学,其学生皆备餐钱就食在校学习。

因为京城开封的办学条件好,有的家长为了使子弟能够进入好学校学习,不惜拉关系寻门径,甚至采取冒散县户等手段进入在京小学。也有些富裕人家,不惜以重金聘请家庭教师“次教之五经”,以达到取得神童功名的目的。

但如此人工造神,神童质量必定严重下降。对此,宋高宗很清醒:“上有所好,下必有甚焉,盖由昨尝推恩一二童子,故求试者云集,此虽善事,然可以知人主好恶,不可不审也……朕即位以来,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,未闻有登科显名者。”所以,对于这些神童,宋高宗一方面限制参加童子试的人数,另一方面对于推荐上来参加考试的童子,采取奖赏后均予以放回原籍。对于童子试的改革,宋高宗从改革考试制度、考试内容着手。要求应试童子除记诵经文,须赋诗、会诵读、理解御制诗文,以考查考生的理解力和遣词造句的作能力。

神童被筛选出来了,但是离国家有用之才还差得远。久而久之,这些神童随着时间的流逝,慢慢地销声匿迹了。

王安石曾记述一个神童方仲永的遭遇。方仲永五岁时就会写诗作文,邻居乡亲看了他的诗“甚为奇之”,并纷纷送钱资助,于是方仲永成了当时的“网红”神童。可是他的父亲不是好好培养孩子,而是拿儿子的天才来谋利,整天带着孩子访亲问友,以获取钱财,不再让他学习。于是渐渐“不称前时之闻”,而终成“泯然众人”,最终沦落乡野,无人问津。

对此,王安石感慨道:“仲永之通悟,受之天也,其受之天也,贤于材人远矣。卒为众人,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。”神童再聪明,如果得不到应有的继续培养和教育,也难成大材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